学术专论

“新闻互竞”：明清鼎革之际的时事信息传播与时政议题

胡　丹

[摘要] 在1644年甲申之变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官方信息网络几近瓦解，民间时事记录与传播却兴盛一时，在报道“国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现了明亡之际最为典型的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互竞”。针对时事的集中报道，拓宽了时人的信息渠道，激发了他们关心国事的热情。但动乱的时局、复杂的政治纠葛和南北时空差异，均对时政议题设置及其叙事造成潜在影响，其结果是南北政治信息关注的重点不同，以及大量讹言和虚假信息的产生。明清鼎革之际时事信息传播之盛，是传统社会极为少见的现象，亦是观察古代政治传播的一个有价值的标本。

[关键词] 明清之际　甲申之变　政治信息传播　时事议题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5－0054－010

崇祯十七年（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到次年乙酉五月南京弘光政权为清军所覆，这段时间可称为明朝的灭亡期。① 天崩地坼的时变，促进了时事新闻的传播，特别是围绕甲申北京之变（简称“国变”），产生了大量时事记录文本。对此盛况，时人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如冯梦龙称之为“喜事竞传”，杨士聪称其为“新闻互竞”，② 都非常精妙地使用了一个“竞”字。

对于甲申之变后的时事新闻传播，学者已提出“明清交替时期的信息传递”的问题。③ 这一

[收稿日期] 2025-02-21
[作者简介] 胡丹（1971—　），男，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宜昌443002，rwtx@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代时事书写与政治信息传播研究”（21BZS063）、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清‘甲乙鼎革之际’时事书写的整理与研究”（22D030）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称的“明清鼎革之际”，是指明朝南、北两京相继倾覆的这一年多时间，又称“甲（申）乙（酉）鼎革之际”。

②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③ 日本学者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1991年）较早从江南出版文化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惜未及展论。其后岸本美绪《崇禎一七年の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译文《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发表于《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将北京失陷的消息形容为“明朝灭亡的冲击波”，梳理了该年四、五月间北京消息在江南传递的情况。相关成果还有王燕晨：《明清交替之际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影响——以冯梦龙的历史著述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胡丹：《明清“甲乙鼎革”之际的时事新闻传播》，《三峡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等。

时期丰富的私家纪事材料，也为梳理明亡前后的信息传递与士人取向提供了便利。[①] 这些文本历来被归入“明末野史”，或纳入“回忆录”“当代史”的研究。[②] 实际上，它们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时人记时事，其书写与传播皆在事变后不久，在当时是“新闻”而非“史”。[③] 认清这一点，为我们从时人的角度和立场考察当时的信息传播机制、流言与时政议题生成的动因，以及时人如何根据自身利益和对时变的理解进行叙事，提供了可能。本文拟从明清易代之际新闻“竞传”的背景出发，勾勒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时事信息传播的总体“事态”，在此基础上对南、北政治流言及其与时政议题设置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败裂与隔膜：明亡之际南、北时事信息传播大势略说

崇祯初，大乱渐起于西北，随之泛滥于楚豫江淮，历十七年而天下解体。在此过程中，明王朝的统治体系遭到撕裂，官方信息网络亦如裂裳，可以说，明朝统治解纽的过程，也是大一统的政治信息网络崩解的过程。如农民军反复流动作战的湖广，地方统治机构几近完全被摧毁。楚北重镇襄阳，两次失守；与其唇齿相依的郧阳，崇祯十四年后任命了两位巡抚，都因路绝无法到任，甚至“讹传郧城久陷者，遂寘郧抚不复推矣”。[④] 崇祯十六年六月，郧使突然抵京，才知该镇还在官军手中。可是待朝廷信息再传回郧阳，又到了十七年四月，北京已在一个月前陷落。

明朝在郧阳设立湖广行都司，置抚治都御史，控驭荆襄三省交界之地。其西北界至楚省（武昌府）一千二百里，由楚至京三千二百里，“异时州郡有盗贼猝发，所上奔命书，由省驰至京师可十日；京师戒严，有大丧，由省下州郡，二十日亦尽闻”。[⑤] 也就是平时有大事，信息由郧到省再到京，最快只要十天；反过来，由京到省再到郧，至多也只要二十天。可在当时专差往复，竟以年计！

崇祯十七年三月，郧阳分守道高斗枢遣使赴楚省乞援。七月间，使者带回北京陷落、南都已立新主的消息，前后历时四个月。过了几天，另一路使者回来，向高斗枢报告，他在本年二月已被任命为陕西巡抚。明廷的这项任命，本是考虑到李自成已据关中，拟命高斗枢固守川蜀门户汉中兴安，却不知该地早已失守。[⑥] 由于官方信息网络崩坏，明廷在灭亡前的军政部署，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军渡河入晋。如此重大的军情，却迟至次年正

---

① 代表性成果有巫仁恕：《逃离城市——明清之际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难经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3 期，2014 年；李惠仪：《性别与清初历史记忆——从扬州女子谈起》，《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 年第 2 期；朱亦灵：《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② 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 8《甲乙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348–379 页；司徒琳：《捉摸不定的早期现代性：以遗民文集为个案》，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429–485 页；钱茂伟：《论晚明当代史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戴辉：《明清之际有关甲申之变的“当代史”著作编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1 期。

③ 研究晚明出版的学者已注意到某些江南文人（如冯梦龙）从事新闻写作，其著述包含一类特殊的“新闻出版物”或“新闻集”（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79–84 页），然多一笔带过。这些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可以作为时事新闻、时事评论来看待的书籍，常被视作“史籍”，如上引王燕晨论文，研究“明清交替之际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影响”，却“以冯梦龙的历史著述为中心”，显然将冯氏的时事作品当作了历史著作。胡丹、李花蕾的《明清“甲乙鼎革之际”的时事书——兼及时事纪录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 年第 5 期）首次对这类时事文本不同于史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概括称之为“时事书”。

④ 高斗枢：《存汉录》，《中国野史集成》第 29 册，巴蜀书社，1993 年，第 464 页。

⑤ 李邺嗣：《三楚旧劳序》，《杲堂文钞》卷 1，康熙十七年刻本。

⑥ 高斗枢：《存汉录》，《中国野史集成》第 29 册，第 464 页。

月二十八日才传到北京。[①] 不久，农民军突入京畿，“势已决突焚栋，而朝中或传关不守，或传贼已退，求一确报不可得”。直到听说“贼”至昌平，兵部才仓促募“塘拨”（即探马，又称“拨儿马”）出探，然而“募一提塘官，竟无其人”。[②] 正是这样耳目不灵，所以京城的骤然陷落，才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

明末之乱，主要在江淮以北，长江以南尚大体稳定。江南人士对于北方动乱的情形，缺乏真切的了解。参与编纂明季“流寇长编”的吴殳，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自述，他说：“（崇祯初）微闻关、陇间风尘有警，殊不屑意。俄闻扰并、豫，窜扬、梁，俄闻破雄藩，据关、陕，乃知骇异，犹谓亡我社稷在几何年。忽尔煤山信传，普天同痛，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天邪、人邪、鬼邪？”[③] 江南人对北方时局的风云变幻，不过在“微闻”“俄闻”“骇异”间，“忽尔”就噩耗传来，表明他们对于亡国毫无思想准备。

士人对于时事的隔膜感，还可从时居浙江绍兴的御史祁彪佳的日记见之。[④] 崇祯十七年的前三个月，祁氏的生活就是典型的江南乡宦的日常，每日忙于应酬与家事：正月初二日，祁家寓山新园破土动工，主人忙着规划、会计。正月十五日还惬意地记道：“至夜，月色皎然，为五六年来所未有。”日记所系时局者，不过地方民变。到二月初十日，始记“闯贼入秦”（事在上年十月），亦只此一句，别无评语。三月底以后，“西北事孔亟”的记载才多起来：二十六日从来信知“真定已破”（事在上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三日，闻京城戒严，但到初六日，对京城是否被围，消息仍“未确也”；初十日，祁彪佳赶赴南京，一路流言纷纷；二十七日抵京郊，方有友人来告“燕都之变”的确信。

祁彪佳是居乡官员，信息来源广，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获时政信息，绝少来自官府。如他在四月二十七日过句容，住巡抚署中，就没听到任何消息，倒是当日“薄暮，柴莲生自南都来，道三月十九日燕都之变甚确”。足见官方信息之迟滞，远不如汹汹乱传的流言。

甲申正月以后，南下的主要通道运河，因兵寇横行，信息传递受阻，南京最后一次接获北京消息，是二月二十八日崇祯帝所发勤王诏，此后再无任何“京报”，只能依靠踉跄而至的北中逃亡者提供信息，然皆淆乱不确。由于没有可靠的“侦骑”，军中塘报只能依据逃民口述，内容严重失真。[⑤] 对于京城陷落这样的大事，作为东南屏障的淮安军门，三月二十九日才得报，竟又费时十一日，到四月初八才予以证实。[⑥] 南都确认崇祯死亡更迟至四月底，距北京之变一月有余。这让专程从嘉兴赶到南京探听消息的陈贞慧发出“金陵重地，不异僻壤；司马、宗伯重任，所传不异道路”的叹息。[⑦]

由于“南北之耗不通”，南都久久无所作为，如福、潞诸王早在三月初就逃到淮安，官员却“恐北耗未确，逡巡未决”，为稳定人心，只能“禁讹言者，杀亡赦”。[⑧] 直到五月初三，才奉福王监国，建立弘光政权，而在此前一天，清军已进入北京。当江南终于准备迎接“闯贼”的挑战时，不想北京已换了主人。

---

① 程源：《孤臣纪哭》，冯梦龙编：《甲申纪事》卷 3，《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巴蜀书社，1993 年，第 151 页。

② 刘尚友：《定思小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66 页。

③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陈协琴点校，辽沈书社，1993 年，第 1 页。

④ 祁彪佳：《甲申日历》，《祁彪佳日记》卷 14，张天杰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719–741 页。

⑤ 如淮抚路振飞三月底所接塘报，竟据流言，称“今闯贼被宣、大兵马杀退，回至代州，其居庸、固城等关俱被官兵阻塞”。《副总兵刘世昌塘报》，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年，第 25 页。

⑥ 滕一飞：《淮城纪事》，商务印书馆，1911 年，第 3a–3b 页。

⑦ 陈贞慧：《书事七则》，《中国野史集成》第 37 册，巴蜀书社，1993 年，第 586 页。

⑧ 姜曰广：《过江七事》，《中国野史集成》第 31 册，巴蜀书社，1993 年，第 289 页。

二、“国变”的中心：时局发展与北京城的流言

崇祯十七年初，随着大顺军一路东进，恐慌在京城蔓延。据目击者说，三月初二日，“南归者数千人，车马为一空”。① 为遏止外逃，九门开始“盘诘奸细，一应官员家眷，不许出城”。② 自崇祯以来，京畿三遭后金（清）铁骑残破，似乎具有了某种免疫力。三月十六日，听城外炮声远震，辅臣与六部科道等官皆曰：“无害！藉圣天子威灵，不过坐困几日，拨云雾见青天耳。”诸臣言笑自若而已。③ 但仅仅三天后，京城就陷落了。弥漫在朝臣中的泄沓之气，很大程度是对形势缺乏准确判断造成的。

城陷后，京中流言充斥，初始议题主要集中在崇祯君臣身上，譬如有多种传言称天子出逃，直到煤山发现帝尸，谣言才不攻自破。“满朝百官”的动向，则始终是“喜事者”关注和记录的重点，如陈济生藏身陋屋，从衙门长班那里抄录榜文、告示，录成“一纸”《陷城日记》，后携之南下，撰成《再生纪略》；徐凝生将所见“从贼”官员门前粘贴的“钦授官衔”门帖，一一抄录，撰成《国难睹记》；吴邦策“苦心搜访，并吏部告示，名字私记，藏之发中”，到南京后刊成《国变录》；等等。④ 这些信息由逃亡者传到南方，成为江南争相传抄的热门时事新闻。

很快，平西伯吴三桂成为京中流言的主角，贯穿了大顺军破城、据城直至弃城的全程，成为最大的舆论议题。据锦衣卫指挥张怡说，三月十九日破城之日，御史周亮工写牌称，“总兵吴三桂统兵三十万，已抵近郊，御前发银十万犒师”，遣人在城中持呼。⑤ 这是关于吴三桂的第一条假消息。真实情况是，吴部二十二日还在距京五百多里的永平府。这条假消息出自官员有意识的“造谣”，目的是安定人心（与一般认为的谣言淆乱人心正好相反）。

逐渐地，“联虏讨贼”说成为吴氏议题的主轴。《燕都日纪》记，三月二十九日，城中已传吴“勾结东（虏）进口讨贼”。⑥ 同日，陈济生也听闻“总兵吴三桂请大清兵进口讨贼”。⑦ 李自成入京之初，曾招揽吴氏，吴已举兵来归，不料在二十六日突然变卦，返师回攻山海关，大顺官员纷纷逃回，这与二十九日的传言可对应，但“东虏起兵”之说纯属捕风捉影。史载，清军四月初九日才从沈阳“声炮起行”,⑧ 十五日与吴部接上头，从时间上看，此前关于吴“勾虏”或“东虏起兵”的传言皆出“想象”，是不实信息。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携明太子亲往山海关讨吴，大军刚离京，便讹传其大败（山海关之败，实在二十二日），次日城中还出现“伪示”：“西长安街有示复黏贼（刘）宗敏示上，内称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的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等语。李伪都督察访，了无踪迹。先是亦有私示，宗敏擒其揭示处数十家骈戮之。此示揭于黄墙之上，左右俱无住人，法无所施，由是惶骇。”⑨ 这些“伪示”“私示”显示，京中存在一股反抗大顺的力量。四月二十六日，即李自成兵败回京的前一天，城内又“传吴帅告示入城”。⑩ 随后更遍传吴三桂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先行张示，令官民为先帝服丧。许多人听信流言，主动换上白衣冠，但也有人看到

---

① 刘尚友：《定思小记》，第 80 页。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 4,《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365 页。
③ 陈济生：《再生纪略》上,《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366 页。
④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 8，第 352 页。
⑤ 张怡：《谀闻续笔》,《中国野史集成》第 37 册，第 595 页。
⑥ 无名氏：《燕都日纪》，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 6,《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202 页。
⑦ 陈济生：《再生纪略》上,《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372–373 页。
⑧《清世祖实录》卷 4，顺治元年四月丙寅。
⑨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 33 页。
⑩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 35 页。

京城东门外“张贴告示，首称大清国”，“不知所谓”。[①]

吴三桂统率的关辽铁骑，是当时近京唯一的一支明朝兵马，这决定了他在流言中的地位。时人虽不能详悉吴、清勾连并合兵大败李自成的内幕，但清兵多次破关袭掠的恐惧记忆为“东虏”在传言中安插了必要的角色。从众多围绕吴三桂和明太子的虚假信息可知，人们对吴扶太子回京“恢复”（复明），是怀着心理期待的；吴、“虏”联兵，也是对形势发展的合理推断。于是，在 40 天内三易其帜的北京城，就形成了这样具有强烈“预见性”的特定议题。

然而，五月初二日，当北京官民依约出迎明太子时，却发现来者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而吴三桂率军往南追击农民军，并未进城。人们大失所望，但“联虏复明”说并未破产，进入北京的清军打起“为明复仇”的旗号，从此“复仇”与“恢复”两说搅在一起，南方弘光政权一直为其蒙蔽，七月底还遣使到北京册封“联虏恢复”有功的吴三桂，殊不知此人早已受封平西王，甘心投靠了清朝。

作为虚假信息，“吴虏联兵复仇”说包含了颇多理性因素，这是它在明亡之际广为人采信的根本原因。其说先于事实而生，因而是不实的，但它又未尽然为事实戳破，反而为时局的发展所部分证实；由于该谣言是诸种合理性因素综合“生产”的结果，导致它作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议题（或解决方案），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即便当真相（即吴非“恢复”，而是降清）揭晓后，仍久不消散，甚至成为南明极力追求的虚幻的政治目标。

分析“国变”中心北京的流言，不难发现，其议题紧紧追寻甚至超前于局势而展开，显示了北京官民对其命运的高度关切，这与江南对北京消息的报道主要围绕“百官忠逆”议题（即城陷后百官的去从）大为不同。南方对即将到来的亡国大祸缺乏足够清醒的认知，这除了信息不灵的原因，还可能与江南对北方时事惯常的隔膜有关。以上表明，时人对时局的不同关切，对于传播的时事信息内容以及相关议题的设置具有重大的影响。

三、由口传到“报道”：纸质媒介成为国变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

在京城易帜的混乱中，大批官民外逃南下，以南方人和不愿“降虏”的朝臣居多。清军进京后颁行剃发令，促使更多的人南奔，给江南带去北方的各种消息。

在传统社会，时事新闻传播以流言和口传为主，等到时过境迁之后，才通过文人笔记或修史，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而在明亡之际，多元的作者群体参与笔录时事，多样的纸质媒介传报时闻，为后人留下极为丰富的一手“时事材料”。住在上海县的姚廷遴，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获知国变消息的媒介与时间：五月初五日这天，他正在举行家宴，“忽报沈伯雄来，觉怆惶之状，手持小报云：四月二十五日，闯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等语。叔祖闻之大惊，大伯、二伯俱失色无措，遂收拾杯盘，斟酌避难。不一日有大报到，民间咋闻。又不一日，报福王监国南京。又闻即位称帝，先红诏，次白诏，俱到，乡绅官府哭临带孝”。[②] 可知姚廷遴先从民间小报得知国变消息（但所传时间误），然后是大报，最后才看到官方通报。奇怪的是，福王五月初三日监国，次日发布哀诏（白诏），十五日登极，次日发布大赦诏（红诏），应是白诏先到，红诏再到，可这两份诏书到达上海的时间，不知何故，竟颠倒过来。不管怎样，官方信息传递迟缓，在与民间信息的竞争中落于下风。当时，江南民间不仅有小报、大报，市上还有大量时事抄本与坊刻，传递着北京之变以来的时政要闻，使得官方的“禁讹言”沦为一纸空言。[③]

最早的纸质信息媒介，是北来逃人携来的“传单”。冯梦龙很注意搜集北方消息，他说：

---

① 刘尚友：《定思小记》，第 74 页。

② 姚廷遴：《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54 页。

③ 弘光政权虽有“禁讹言者，杀亡赦”之令，但似乎所禁者为“匿名蜚语”（谈迁：《国榷》卷 102，中华书局，1958 年，第 6110 页），市上流行的记述时事之书，或不在查禁之列。

“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候选进士沂水彭遇飏于四月一日，候选经历慈溪冯日新于十二日，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日，先后逃回，各有述略，不无同异。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吾乡有贾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则李贼已遁，而燕京化为胡国，所述甚悉。”[①] 冯氏的采访对象，最早是四月初一日从北京逃回的彭遇飏（按路途算，他应在二月底北京未破前离京），最晚是五月十五日出京的同乡商人。由于南逃时间不同，彭、冯、盛诸人仅能“述略”，张魁则携有文字传单，然“未及纪事”，而更晚些的，已叙事“甚悉”了。可见在几个月里，“北报”越来越多，冯梦龙据以写成新闻报道《甲申纪闻》。就在他准备付印时，“复有传来《燕都日纪》一册，不知出自何手，其叙事颇详，多前所未闻，且云出于目击，自三月朔迄四月十三，凡四十二日事”，于是一并刻出。[②] 这两种坊刻均于当年出版，不过二千余言，杂采事实，按日纪事，实际上是北京之变的专题报道。

“国变”消息在江南报道之盛，前所未有。新闻素材除了口传消息，多来自逃亡者密藏的“单”和“纪”，如冯梦龙提到的“北来公道单”，“北来”指其来路（或称“京抄”），该单专记百官“忠逆”，为自诩真实，冠以“公道”二字（又有“讨逆单”）。冯梦龙在编辑《绅志略》时，就参考了多种传单，称为“他单”“各单”；因所传信息有先后，先后所记又多不同，故复有“北来初单”之说。这些传单多为数百至千余字的纪实性短文，如宁武关提塘都司杨志荣纪宁武之战的揭帖，以及《陈方策揭》等，皆以“揭单”的形式传报时事，流传甚广；还有一种《陈方策塘报》，则借“塘报”之名传报李闯消息。[③] 大理寺卿凌义渠在京殉难，他的女婿据家奴的讣报，写成《大廷尉茗柯凌公殉节纪略》，也作为一种“新闻特写”广为流传。此外还有一些书、策、檄等文字，以不同的文体，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国变消息，或发表对甲申以来时局的看法，辗转传抄于众人之手，共同构成快速传递信息的纸质媒介。

明代人“好纪录时事”，[④] 时事写作有其传统，到了末年，无论作品之种类，还是报道之快捷，均达到了高峰。例如崇祯末李自成三攻开封之役，记录城守经过的文本，今见就有 5 部之多。[⑤] 北京之变前后的大事，几乎都有相应的纪事，如保定之战有张罗彦《保定张氏殉难录》、郭棻《甲申保定府殉难记》、陈僖《崇祯十七年保定府纪事》，鲁北之乱有程源《孤臣纪哭》，沧州之变有程正揆《沧州纪事》，淮安备御有滕一飞《淮城纪事》，扬州、京口兵变有佚名《扬州变略》《京口变略》，等等。当然，报道最多、最集中的，还是“闯王进北京”，除了前面提到的无名氏《燕都日纪》、冯梦龙《甲申纪闻》、陈济生《再生纪略》、吴邦策《国变录》、徐凝生《国难睹记》，还有冯梦龙《绅志略》《北事补遗》、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等，据笔者所见，不下四十余种。除了单行本，还出现了“甲申新闻集”，如冯梦龙辑《甲申纪事》、顾炎武辑《明季实录》等。

时人辑录传播时闻，已为风尚，民营书坊尤乐于出版，且以出自目击者最受欢迎。著名学者、翰林院检讨方以智逃到南京后，就从某监生手里买到一部书稿，刻印出版。[⑥] 东海布衣盛国芳，除了向冯梦龙口述见闻，自己也写了一部《北游纪闻》。这些作品，多为逐日纪事，篇幅只“一卷”，书写与刊刻时间距所纪时事非常近（不过数月），具有突出的纪实性与新闻性。笔者对今存“甲乙之际”的时事文本做了初步统计，已在一百五十种以上，其新闻竞传之势令人惊叹。

在明末的大动乱中，重大时事连续发生，众口相传的流言无疑是最快的，然而此际出现的新现象是：时事被官民士商等不同身份的“好事者”记录下来，形成具有一定主题和书写规

① 冯梦龙：《甲申纪闻》，《甲申纪事》卷 1，《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117 页。

② 无名氏：《燕都日纪》，第 196 页。

③ 李天根：《爝火录》卷 1，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85–87 页。

④ 李世熊：《贵州威远道佥事黄际飞传》，《寒支二集》卷 6，《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89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526 页。

⑤ 即黄仲霖《誓肌漫纪》、张宁生《汴围纪略》、李光壂《守汴日志》、白愚《汴围湿襟录》、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⑥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 24–25 页。

范的纪事文本，广为传抄、刊刻，从而具有了时事报道的性质。当随意的口传变为精心组织的“报道”，形成时事文本时，记录者在落笔之际，必然会融入更多的主观意识与好恶情感，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特定议题进行书写。

四、从无意、立意到刻意：“国变新闻”讹误背后的政治议题

甲申之变后，人们急于了解北方消息，这是时事文本大兴的根本原因。然而纸媒的报道也存在内容驳乱、真假难信的状况。《甲申核真略》的作者、左谕德杨士聪，在清廷实行剃发令的前一日（五月初七日）离开北京，属于南归较晚者。他到南方后，已见市上有大量记载甲申之变的新闻坊刻，其中错讹百出，“一事而甲乙互异，一人而彼此迥殊”，究其原因，除了“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很难避免“转相舛错”外，还与当时“新闻互竞”，传报太急有关。他说：“其始国难初兴，新闻互竞，得一说则书之不暇择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遗，有所误，有所颠倒。此出于无意，一变也。”[①] 例如钱士馨在三月中旬出京时，京中哄传襄城伯李国桢冒死抗言、谏争“三大事”（礼葬先帝、不杀诸王、不侵陵寝）并自杀殉帝。四月间，美谈依旧。可是五月中钱氏再次入京，传言“与前闻乃大异，久而襄城误国之论，盈于人口矣”。[②] 事实是，李国桢是受不了酷刑逼赃自缢而死，依当时对百官忠逆的分类，属于“刑辱”者，其殉义之事毫无实迹，出自不知何人之口的“妄饰”，人不暇择，故多信之。但从吴三桂、李国桢的事例可见，在“国变”的中心北京，误传的信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可是当此类消息传到南方，空间上发生转移，特别是当多种流行文本皆有误记时，就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力。如“刑辱”而死的李国桢竟被推为头号忠烈，在九月初三日得到弘光政权“贞武”的追谥，[③] 直到清初编写戏剧的《铁冠图》，仍在吹捧他的“尽忠死节”。[④]

在江南的时事报道中，“百官忠逆”是最为热门的议题，影响亦最烈。占朝臣主体的南方籍官员，于国难之际的表现，在江南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殉节”者自为乡梓之光，“从逆”者则顿为“蒙面丧心”之徒。江南十余县学校联名发表“讨降”檄文，各地以“本乡”为单位，共同发布“讨逆”公揭、公檄，甚乃群起捣毁“逆臣”之家，其所依据的，就是“北来新闻”。吴郡《公讨降贼伪官檄》就称：“若云事涉罕证，则从北来者，自士商以至仆隶，何以所传无异辞？”[⑤] 可见吴郡士人是以新闻“所传无异辞”作为取信标准的。

甲申六月，南都首辅马士英首劾“从逆诸臣”，八月定“从逆”六等罪。与此相应的，是时事报道争相登载北京诸臣的忠逆表现，并擅为分类，如吴邦策《国变录》分诸臣为死难、刑辱、囚辱、潜身、叛逆、授官、诛戮七款，冯梦龙《绅志略》分死难、诛戮、刑辱、幸免、从逆五款。这无疑含有“定忠逆”的目的，进而成为政争利用的工具，故而延至乙酉年，类似纪事仍是多种新刊时事书（如冯梦龙辑印的“新闻集”《甲申纪事》）的重要内容。

这样的舆论形势迫使南逃回来的官员上疏、进揭，为自己辩护，一时“辩揭”横出。如“当时颇重其书”的《国变录》，就将职方郎龚彝列入“授官”之列，实际上接受伪官的，是他的弟弟庶吉士龚鼎，龚彝疏辩后，吴邦策就“以私撰受累”。[⑥] 有的官员则选择自撰报道，以澄

---

①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 6–7 页。

② 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3 页。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2，中华书局，1984 年，第 86 页。

④ 清初野史记李国桢之子李公藩“以千金赂李渔笠翁，作《铁冠图记》，为父作尽忠死节戏文，掩饰奸状，以愚草野耳目，人皆信之，尽属乌有也”（郑达辑：《野史无文》卷 4，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9 页）。但李公藩不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他应该是利用了误传的消息。

⑤ 袁良弼等：《公讨降贼伪官檄》，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 8，《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235 页。

⑥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 8，第 352 页。

清行迹，如方以智到南京后，很短时间内就刊书二种（一种为购买他人作品）；杨士聪撰《甲申核真略》，也有自辩的目的。

国变的报道者，往往就是事件当事人，其书写不可避免地羼入主观性（意气或利益）。加之南都政争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事坊刻之讹误，自如杨士聪所指，由最初“新闻互竞”所致的“无意”之失，二变为“立意”，三变为“刻意”。①诸多新闻枉顾事实，凡切于己者必巧加伪饰，记他人之事则全凭“爱憎”。冯梦龙在编辑专记朝臣“忠逆”的《绅志略》时就感叹：“第流言互异，宁无虚实之参；喜事竞传，或出爱憎之口”，指出一些传言纯属无中生有的诽谤。②

在当时的语境下，时人习惯将不实信息分为“君子之过”与“小人之过”。③事实上，许多肆口而造的谣言，恰恰出自所谓“君子”，前贤称其出于“东林、复社爱憎之口”，故“造言污蔑之不已”。④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亡之际的江南，既有东林、复社与阉党的对垒，又有壁垒森严的门户，更有漫无边际的君子、小人之争，都使得江南“竞传”的时事信息及其评议，在政治伦理极端对立的框架下呈现出极为纷乱的特征，更由于某些谣言“刻意”之深，难以辩驳，有些至今仍在流传。⑤

梳理明亡之际的热点议题，如谏阻南迁、收葬魏忠贤、先帝血诏、北京献城、百官忠逆、真假太子等，报道纷拏，却事实不清，虚实相参，甚至不乏子虚乌有、情节宛如戏剧者。那么，这些纪事是否就像一盘散沙，毫无线索可寻呢？也不尽然。细读“甲申新闻”，会发现诸多纪事，虽情节不一，彼此之间却颇能相通，如时人记北京城破前所谓群臣议举冯铨、杨维垣、霍维华等阉党，崇祯帝与太监对哭，“御案手书十二大字，密示司礼，看毕，随即抹去”（传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员可杀”之语）；⑥自缢前书血诏，复称“文武皆可杀”；又诬诋自杀殉国的阁臣范景文而力捧刑死的勋臣李国桢……将其并置对观，就能发现一个潜在关联的叙事主题，即众口皆称的“文武误国”。⑦再将这些“新闻”放在南都政治形势下：阉党力图翻崇祯旧案；宦官欲重开东厂；勋臣跋扈，汲汲于攫取入阁、预纠参等破坏祖制的权力。⑧这容易让人联想，“臣子负恩，文武尽贪庸之辈”的话语，固然有为亡国追究责任的特殊舆论背景，但何尝不是勋臣、宦官极力主导的政治议题，而由“一二逢迎时局”者刻意造作而成？⑨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它是否有效呢？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历史在权力话语的左右下，其目的可以简单归纳为“保留”和“消除”。⑩纵观南都时事信息“竞传”“互竞”的态势，可知

---

①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 7 页。

② 冯梦龙：《绅志略》，《甲申纪事》卷 2，《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135 页。按，冯氏在编辑时尽力做了考辨，如传言周皇后之父嘉定伯周奎，为活命，将藏在府中的太子献出。可是他遍阅诸家报道，发现“都中绝无此语”，遂判定此说“出自彼亲戚之口，大都以吝招谤耳”。（第 134 页）

③ 全祖望《明太常寺卿晋秩右副都御史茧庵林公逸事状》将“野史”出于传闻之误者归为君子之过，而将如邹漪（著有《明季遗闻》）受贿、受嘱为张缙彦、李明睿等人开脱，称为“有心淆乱黑白，是小人之过”。《鲒埼亭集》卷 26，文海出版社，1988 年，第 1092 页。

④ 杨凤苞：《南疆逸史跋》，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76 页。按，在谣诼蜂起的南都，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些记载竟诬称弘光帝母子为假冒！而它恰恰出自所谓“君子正人”之口。参见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年，第 117–122 页。

⑤ 如传崇祯帝在北京陷落前，下密旨收葬魏忠贤，就是一条典型的深具政治背景的谣言，然论者多不以为疑。参见胡丹：《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兼论“甲申”政治叙事》，《贵州文史丛刊》2020 年第 3 期。

⑥ 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 4，《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166 页。

⑦ 这是鼎革之际最为流行的亡国论话语，如成书于“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姚廷遴：《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第 55 页）的时事小说《李闯小史》，第二卷就题作“北京城文武偷安”。

⑧ 秦博：《勋臣与晚明政局》，《史林》2015 年第 4 期。

⑨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第 8 页。按，“文武尽贪庸之辈”语，亦见于史可法《出师檄》（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 7，《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223 页），可见这个议题有多么的深入人心，论亡国者必复申之！

⑩ 杨波怡：《福柯话语权简梳》，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2 页。

弘光政权中的某些势力，尽管努力制造议题，传播虚假的政治信息，却无法通过“消除”以有效管控信息，并在牢牢控制话语权的基础上掌控权力。[①] 因而在国事议题的设置上，谁能持久书写，谁就能更有力地行使话语权。不久以后，当宦官、阉党、勋臣集团随明朝一齐覆灭，作为遗民的东林、复社士人，则自然掌握了继续解构并解释这一段亡国历史的权力。

五、结语

明末舆论发达，前人述论已多，但舆论议题的生成，离不开相应的信息支持，而信息与舆论之关系，学者着墨尚少，对此深入研究，能够催发出许多有价值的新讨论。例如信息机制与鼎革的关系，陈贞慧就认为弘光政权的失败，“始失之游侦不以时”。因为“京报”断绝，无法及时掌握真实的北方情报，南都大老束手无策，“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陈氏还注意到，当时局急剧变化时，及时掌握信息能够带来政治上的主动，如“凤泗巡抚马士英以得北中消息最近”，在迎立福王上抢占先机，遂一举入阁，登为首辅。[②] 还有一些信息传播现象值得注意，如北京陷落前，邸报已绝，然而梅村野史、黄宗羲等人撰史，却引用了明季弘光或“三王”时的邸报，[③] 时人也有“阅邸抄从逆姓名，不禁懑愤”等言论，[④] 这势必引起南明是否恢复邸报发行，或邸报别有所指的疑惑。这一时期，还有众多士民阅读、交流塘报信息的纪事。塘报所载，应为机密军情，但今见明末塘报，却多为时人见闻的报告，甚至还出现了冠以私人之名的《陈方策塘报》，查其内容，不过是一篇“图闯”的时评。[⑤] 综合这些现象，似可推断，在明末的大众信息传播中，已出现借用权威的邸报、塘报等官方信息媒介的名称，用于撰写并传播时事的现象，“官名私用”现象显示了民间信息传播的强大活力，也是皇权信息控制力削弱的表现。

从鼎革之际的时事信息传播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特点和不足。如当邸报不能稳定提供时政信息甚至于断绝后，书信乃成为士人交流和验证时事信息的主要媒介，祁彪佳日记就常记友人“询北来之信”，或问“都门家报”，彼此持书传阅，交流书信内容。但普通人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主要通过民间报纸和传言获悉时情。检祁氏日记，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到四月二十八日，收发的书启禀札在百封以上，仅提到邸报一次、塘报四次，却完全没提到大报、小报。这似乎显示了，官绅与庶民各有其主要依赖的信源。然而无论官绅士民如何主动获知时事，所得的信息总是片断的、破碎的，甚至是抵牾矛盾的，受众为各自有限的信息渠道所制，难以从总体上判断局势，把握时局走向。

同时，这一时期的信息传递体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异，在北方，人们对官员在亡国时的抉择给予较多同情，而南方则完全站在道德高地予以无情督责。这一差别表现在信息生产上，是北方的流言紧随朝代更替，深切于时事变迁，更关注兴亡，而南方却始终纠缠于“忠逆”等议题，陷在政争的泥淖里难以自拔。南方人不像北方人那样亲历战乱和流离，对阖家赴死的痛苦缺乏

---

① 相关纪事虽极力推崇宦官在亡国之际的忠义表现，如太监王德化拳殴兵部尚书张缙彦，称其与阁臣误国。但种种不利于宦官的纪事仍多，如传万斯同（《明史稿》作者）亲耳听魏姓提塘官说，在北京城破前，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然传“知单”议降，“首名中官则曹化淳”；王德化投降后仍领司礼监的事实也被如实记载。（《怀陵流寇始终录》卷 17，第 321 页）又误传勋臣李国桢忠烈之事，时人魏禧、郑达已撰文辩驳之。

② 陈贞慧：《书事七则》，《中国野史集成》第 37 册，第 586 页。

③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自序作“弘光时邸报”（上海书店，1982 年，第 165 页），梅村野史《鹿樵纪闻》自序前段与之略同，唯此处作“明季三王时邸报”（北京古籍出版社，第 265 页）。按，“三王”指福王（弘光帝）、唐王（隆武帝）、桂王（永历帝），即南明三帝。

④ 彭德先：《愤詈》，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 13，《中国野史集成》第 30 册，第 348 页。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 2，第 85–87 页。

身体实感，故对即将到来的致命危机较为漠然，这表现在本应最为时人关心的北方时局变迁，没能成为江南信息传播的首要议题，人们总凭想象和一厢情愿进行议论和叙事。南北人的时空感也出现明显错位，如学者所指："在北方士人的时间序列中，甲申之变的位置处在整个事件链条的终点位置，是他们明季所遭受的苦难的最顶点。与此相反，江南的时间序列中，王朝衰亡的事件链条是以甲申之变为起点的。"①可以说，鼎革之际，南方建立在纷乱的信息之上的"历史感"常是懵懂和错误的，又由于政争的影响，时事报道中夹杂了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并无助于人们真切地掌握时势与真相（如著名的南渡三案，报道极繁，事实反而愈晦）。

乙酉年（1645）五月，清军南下，占领南京，随即严禁"野史"，发生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这一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罕见的新事，遂如昙花般消失了。

References

Anben Meixu(Mixu Kishimoto). "Chongzhen shiqinian de jiangnan shehui yu guanyu Beijing de xinxi"（Jiangnan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years of Chongzhen and information about Beijing）.Trans. by Di Yan.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1999).

Hu Dan, Li Hualei. Mingqing jiayi dingge zhiji de shishishu: jianji shishi jilu yu lishi shuxie de guanxi (Current affairs book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t events record and historical writing).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News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5(2021).

"News Competition": Current Affair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olitical Topic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U Dan（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rwtx@163.com）

Abstract: On March 19, the 17th year of Chongzhen, Beijing fell, which was the "Jiashen Incident". At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he official information network had nearly collapsed, but the non-official record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urrent events by the common people flourished for a time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ording the national calamity, and this most typical news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appeared at the time of the Ming's collapse: "News Competition." The concentrated reports on current events broadened the sources of current political inform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late Ming Dyansty and stimulated the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s concern for regional affairs. However,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entanglements,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and the space-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ll had a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setting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and their narration.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focu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as different, and a lot of false information was produc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ition, the prosperity of current news communication was rar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it became a valuable specimen for observing the earl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Ming-Qing transition in 1644 and 1645, politic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urrent affairs topics

① 桂涛：《以"甲申"为原点的明清之际——清初河南、河北士人与江南士人对清朝的认识差异》，《史林》2013 年第 2 期。